

《走出江村》序

1992年张智楚同志为我编辑了一本《行行重行行》，今年她又受人民日报出版社之约为我编辑一本《走出江村》。这两集都是从我旧作中选出的杂文编成的。前者以我的行程为依据，后者以我的思路为轨迹。

今年9月，我的亲友旧好为纪念我江村调查60周年在家乡举行了一次欢叙。我把60年来在家乡追踪调查的杂文编成《爱我家乡》一书作为答谢。大概这本杂文选启发了张智楚同志。她可能认为我这个人的思路在过去60年里并没有囿限在家乡这个小小农村里，实际上早就走出了家乡这个小农村，面向全国，甚至已面向世界。《爱我家乡》只表达了我的感情并不足以反映我的思路。也许正由于这种想法，又编出了这本《走出江村》作为《爱我家乡》的姊妹篇。重情还是重思，各有所偏，情思并存才比较周全。

自我初访江村以来的60年里，我确是环绕地球旅行过几次，特别是“文革”结束后的近20年来，我为了已入暮年，可为我所用的岁月已不多，所以我在从70岁开始的“第二次学术生命”里，不能不加快步伐，一天当两天用。在过去的16年里，我在祖国大地上，除了西藏和台湾外，不断地东西穿梭，南北奔走，深深地切身感觉到身逢盛世之幸。

人的思想原本是时代的反映。我的学术生命也无不是从这生处世的所见所闻中形成。江村是我有意识地观察我国农村社会和文化的起点，它也就孕育了我一生的学术思想。饮水思源，自有其感情上的依恋。走出江村之后各地方的接触正是我学术生命得以维持至今的营养来源。《走出江村》这本集子多少把我的发育过程理出一个头绪，使我对自己的思想的生长更能自觉一些，确是件好事。这是我应当向编者和出版社感谢的。

编者要我为《走出江村》写篇序言 其实写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最后我还想加几句多余的话 因为时代还在前进 我的生命还没有结束。回头看过去的一生，总觉得在我头脑里的许多想法总是说不完也总是说不清楚。这几年来越来越感觉到不断反思的重要。反思固然本质上不同于“文革”时的“思想检讨”，但不断地对自己思想多多反复咀嚼却大有回味的。不突破原有的思想框框，也不容易产生新的看法和去注意接触新的事物。客观世界正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一旦凝固，那就必然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落后了就会被淘汰，我年纪越老，这种警惕性也就越敏锐。

我在追索自问，我从农村走进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从小城镇走进了正在遍地开花的中小城市，从中小城市又走进了以正在勃兴的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我当前正在进一步注意这些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是东、中、西以及南北不同经济区域怎样共同发展的问題。我们这许多发展不平衡的地区怎样能联结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形成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经济区域已成为一个急需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我不能不警觉自己生命的限度，这些问题能在我有生之年得到解决么？再想到当前这个已被经济联成一体的世界。在这样多民族，这样多国家，处处是疆界的世界里，人类的理知是否能制约得住传统形成的分裂和对抗，甚至导致破坏和同归于尽，我走出了江村，走出了小城镇，走

出了大中城市，走出了经济区域，走出了全国一盘棋，还得继续向前走，走向何处？让我留这个问题给下一代人去回答吧。

1996年 12月 25 日于北京北太平庄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前景

最近有些朋友知道我刚从家乡回来，特地来找我，要我说说这次旅行的观感，出了个题目，叫《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前景》。

长江三角洲是个地理概念。在行政区划上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苏、锡、常、镇、通五市和浙江省的杭、嘉、湖、绍、甬五市。我很乐于把我这段时间所有的有关想法提出来，同大家商量商量，所以一口气谈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朋友中有人带着录音机。把我讲的话都录了下来，又整理成文交给我。

我们这次谈话时间是在 1997 年 10 月 30 日，在美国还是 10 月 29 日，正是江泽民主席在华盛顿和克林顿总统会谈的日子。所以我这次谈话开始就说，1997 年这一年里，我们有三件大事：一是香港回归，二是中共十五大，三是中美首脑高级会谈。这三件事都是划时代的，继往开来的。从 7 月到 10 月短短三个月这段时间，是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在我们面向 21 世纪的时候，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个转折点的背景，是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

1933 年，我在燕京大学读到四年级的时候，选读了 de Vags 教授开的一门课，叫“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是以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来中国的外国人写的书做基础，来讲他们眼中看到中国的大变化。讲这门课的时候，他指定我们去看哪本书中的哪一

段，我就按着所指定的章节去看。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有一段。太平天国的时候，曾国藩攻打南京，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胡林翼，胡林翼在采石矶那里看地形，看到一艘外国轮船从长江里开上来，逆流而上。他一看到这个场面，就昏了过去，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要变了。他这话很有意思，说明这个人看得很远。他看到了一个转折点，历史的转折点。一方面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一方面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工业力量。这个工业力量已经进来了。这是工业文明的力量，比太平天国的力量要大得多。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对手。从长江水面上的一艘外国小火轮，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就要到来，这确实需要相当的远见。

我在今年访问马鞍山时回想起这段往事，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长江三角洲这一带，是当年那个历史转折点的具体空间。那艘外国小火轮从长江口往里边走，是一个象征，轮船象征西方工业文明，长江象征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当时轮船作为一种兵器，驶进长江，预示着一场历史的转折。一个兵法家，看到了一种新兴力量。从太平天国到现在，大概 150 年了。150 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他看得不错。他预料的局面成了事实。

事隔 150 年后的这三个月，中国和世界历史又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这是 20 世纪向 21 世纪的转折。这两个世纪有什么区别呢？我从经济上看，有一个想法，算是老叟狂言吧，就是要从国际经济转向洲际经济。前不久我去看了北仑港，又到马鞍山访问，去看李白墓，也去了采石矶。从采石矶下来，我讲了一段话，说是到 21 世纪，我们面对的将是洲际经济，而不仅仅是国际经济了。这在接近 20 世纪末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出来一点苗头。最近两年看得更清楚了。最清楚的是欧洲共同体，欧盟。冷战时代的局面已经完全改变了。俄国加入不加入已成了个热门话题，里边就有洲际经济的背景。这次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之前，克林顿

到南美跑了一趟。在他的想法当中，想把南、北美洲搞成一个共同体。21 世纪开始的时候，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格局，将是欧洲、北美、东亚三大块为基地的工业力量，利用非洲、澳大利亚、南美洲的资源，形成一个远洋交通所联系的全球社区。在这样一种格局中，中国要适应这个变化，要跟得上去，至少要有个深水港，有能停靠 20 万吨级以上货轮的码头。有了这样的接触点，中国才能进入洲际经济。

孙中山是有眼光的，他提出要搞个东方大港。我最近一个时期出去调查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就把这件事做起来了。东方大港建在哪里，具体内容是什么，都要弄清楚。我跑了几趟，在内容上清楚了一点，东方大港就是个 20 万吨级以上轮船能停靠的港口。在长江三角洲这块地方，有几个地方具备搞 20 万吨级以上大船停靠的港口？已经发展起来，具有相应规模的地方，是宁波的北仑港。现在，北仑港的深水码头成了宝钢运送原料的一个转运站。澳大利亚的矿砂用 20 万吨的大船运到北仑港，再从这里换 2 万吨的船送到上海，供应宝钢。这样转运，每吨货物的运费要增加 1 个美金。这是个具体例子，说明洲际经济时代的一个特点：原料从很远的地方来，利用巨轮，大进大出。有了深水码头，才能适应这一局面。新加坡能成为东亚的一只小龙，就是个实例。

有人主张现有的北仑港可以发展成东方大港的底子或一部分。当然并不排斥在上海附近的海域进行更深入的勘测，看看是否还有更合适的港口。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东方大港也可能是个由若干港口联合组成的。这主要是决定于地理定势和现代建港科技的发展。如果以北仑港为底子来建立东方大港，当前的问题是怎么样把北仑港和上海这个经济中心结合起来。上个月我去北仑港访问时，听说在搞一条高速公路，越过钱塘江，以缩短沪甬

之间流通距离的设想。当然也可以考虑采取江底隧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至于采取哪种方式 主要决定于哪种方式便宜和投资有没有来源。但无论如何现在应当早日为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在 21 世纪洲际经济的格局中定个位。无疑的是，它将成为东亚地区和世界五大洲经济往来的一个重要的门户。

在洲际经济中 东亚地区可以成为中心和门户的地方 香港也是一个。但是香港的发展要依靠华南这一块腹地的开发。没有腹地是不行的。长江三角洲是一块东方大港的广大腹地，是中国历史上开发了很长时间的地区，是块熟地，不是生地，有这样的优势。如果现在定位比较准确，将来搞得好的话，可以超过香港。香港不过是个洲际经济的联络点，它自己没有腹地，要靠华南。珠江三角洲比起长江三角洲来 长江三角洲要更“熟”一些。江、浙两翼的熟地，加上长江的出口，是个不错的结构。

全球经济的眼光 也许还要进一步扩大 那就是去利用太空资源。人类发展自己的下一步，不但是跨出大洲 而且要走出地球 利用月球、金星这类星球的资源 即太空资源。这在 21 世纪可能会成为现实。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意思，一方面是以洲际经济为特点，全球五大洲成为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另一方面是这个整体不仅利用分布在各洲大陆上和各大洋水底的资源，而且要去利用地球之外的太空资源。

最近几天中美两国首脑在华盛顿的见面和会谈，象征了人类社会进入洲际经济时代的开始。将来要经常面临的问题，不光是国与国的关系，还有洲与洲的关系问题。现在的洲际关系中的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 世纪里边帝国主义采用了通过掠夺别人发展自己这个模式，至今还没有一个可行的方式来替代它，工业中心吃原料中心的事情还在继续。现在美国想以北美为中心，搞出南北两个美洲的经济联合体，困难很多，就是

因为原来的帝国主义发展模式是地区剥削地区。这个模式的残余还在发挥作用，还没有转过来。洲际之间的不平衡，可能是洲际经济时代开始的第一个阶段里避免不了的。从发展上看，工业中心快，资源中心慢，这是历史事实。20世纪里，印度、中国、非洲这些资源中心，供应欧美这样的工业中心，是一种不平等的局面，造成了不平等的结果。为什么要打鸦片战争？还不是人家要我们的资源和市场嘛。

在中国历史上，长江三角洲这一带，是文化发源很早的一块地方，可以回溯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已经有很好的手工艺制品了。我在宁波附近看了河姆渡文化遗址，看到那时已经有种植、纺织、玉器，还有建筑在木桩上的集体居住区。农业出来了，手工业出来了，建筑业也出来了。六七千年以前已经有这么发达的文化，很了不起。可是当时各地文化并不统一，而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分开的。各个区域之间不平衡，经过夏、商、周各代发展下来，直到秦、汉，成为了一个统一体，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强大国家。多元一体的观点，也可以用来看待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从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一直看到今天这样一个大转折，出现了一个以大洲为单位的合作体系，一个洲际经济时代。当然里边会有许多曲折，短则一个世纪，长则1000年，现在只是洲际经济的起步阶段。今天在中美两国首脑会谈的时候，讲这个话，可以作个纪念，算是我们对今后历史的一个展望。

在这个宏大的格局下讨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要树立起区域经济的观点。东亚地区的一个经济中心应该落在上海。上海应该瞄准这个大格局和大目标去做事情，不要分心。把贸易、金融、科技、信息抓上去，把工业分出去，一层层地分出去，利用贸易中心的力量把腹地一层层地带起来，这才是区域经济中的大上海，一个中国经济的龙头。这个大的格局，我从

早年到现在一直在用心思 带着问题到处走 到处看 到处问，一步一步看出来的。回想起来这个思想的根子，可能就是我在燕京大学选修“中国的文艺复兴”这门课里讲的采石矶那一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一生当中的实地调查里边，一步一步地跟着历史的发展看 从一个地方到几个地方 到全国 再到全球 看这段历史的整个发展变化过程。总的思想格局是多元一体。一直到前些天，从北仑港到采石矶，想法又有所发展。说起来很有意思，从采石矶下来，我从南京上高速公路去苏州，一路上看到的城乡外貌，是一个从小农经济到初步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就像我一生看到的这段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西方文明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了，都在那儿变。在这个全球趋向一体的局面下，我们中国文化能为人类社会贡献点什么，应该认真想一想，不能光等着穿西服，喝可口可乐 看西方电影。

1997年 12月 3日于北京医院

长江三角洲之行

今年人大开会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到江苏、浙江两省的代表，受到他们的启发，并结合我这几年在长江三角洲的调查研究，对这地区进一步开发问题进行了一番思考。接着同民盟的同志们展开了讨论，形成了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写成了建议，提交中共中央参考。这是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关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第三个方案。

两年多以前，民盟提出的第一个方案是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中心内容是要把甘肃、青海两省和宁夏、内蒙古两个民族自治区沿黄河上游两岸的地区，利用该地丰富的水电和矿产资源，建成一个我国西部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除供应日益增长的国家需要外，留下部分资源来发展地方和乡镇企业，以达到改变这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民盟为此在两省、两区间牵线搭桥，取得共识。最后作出书面意见，很快得到中央的采纳，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民盟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是关于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设想。这建议是今年3月份送中共中央的。不久山东省东营市来人找我们商量具体的开发方案。原来，中共中央已经把这个建议转到山东省委，东营受命着手具体规划。在胜利油田开发后期如何利用地面资源，发展后备企业。以保证这个地区一旦石油枯竭

经济仍能继续繁荣。

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初步设想是民盟提出的第三个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如何利用这地区的有利条件，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建立一个能带动长江流域腹地的经济开发区。这个开发区将通过长江和陇海铁路这两条大动脉把长江三角洲和西部原材料基地及三线所蕴藏的科技力量相沟通，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形成一条横贯大陆的经济脊梁，迎接 21 世纪新时代的到来。

这份建议交出后，我原本打算去一趟江苏南通，为已由张智楚同志编就的《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补加一篇“南通行”。行程已定，临行前接到江泽民同志的通知，要我和民盟负责同志去见他。大家一起促膝谈心，讨论有关长江三角洲的开发问题。谈话结果，我们表示民盟愿意为这个设想承担红娘的角色，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把这个设想带到地方上去进行意向性的探讨，以使各方能易于取得共识。于是我们改变了原定行程，4 月初开始了包括南京、杭州、上海的长江三角洲之行。

—

开发长江三角洲的设想是在国际新形势的背景下提出的。当前我们可以说正处于世界旧格局开始瓦解而新格局尚未形成的转型关口。在这时刻，我们要有点紧迫感和预见性。只有清楚了世纪交替中的复杂形势，才能站稳脚跟，以新的姿态迎接 21 世纪的来临。

从现在已经比较清楚的形势来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雅尔塔会议为先导所形成的“两霸格局”正在解体，而从东欧动荡中马耳他会议为开始的“四强格局”已

露端倪。两霸指的是美、苏，四强指的是美、苏、欧、日。在这个交替中出现的是两降两升的趋向。四强格局能否持久很难说。新升的两强尚未定型。以欧洲共同体说，德意志统一后将起什么变化猜测很多。西边这一强可能一分为二。东边的日本在经济上已经强大了，但是成为一个大国条件尚未齐备，而且更重要的，东方还有潜力巨大的中国和印度。它们在今后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谁也不敢轻视。四强格局过渡到群雄格局大有可能。

和我们直接有关的是在这个未定之局中所存在的机遇，利用这机遇可以恢复我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有过的地位，进入现代世界上的先进行列。

要达到这个目标，得看看现在的条件。从经济和科技水平来说，我们和当前的先进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是落后了，这点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已打下了向这目标奋进的基础。首先是我们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已经有 40 年了。近 10 年来的改革开放又把我们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航道拨正了。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都已经比 70 年代翻了一番。发展固然是不平衡的，但是应当看到走在前面的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有一部分实现了“翻两番”。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再有 10 年，绝大部分地区达到小康水平是完全能实现的。

再说过去 10 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进展，主要有赖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有赖于国内外局势的稳定。总的看来，在今后的 10 年也不致有大的变化。有了稳定的局面，就能继续进行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在今后 10 年中还有比过去 10 年更好的条件，那就是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祖国。香港基本法的制定说明一国两制的构想是

现实可行的。海峡两岸统一的局势也正朝着有利的方向推进。最近台湾当局已有所松动，台资上陆也出现了新的势头。8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这个小小的岛屿来说，究竟是不容易消化的。台商在各地找出路，找来找去，还是回老家为上策。说到底，原是同根生，谁不愿意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事实胜于表态，我在昆山访问时，市长就从饭桌上被拉出去接电话，一位台湾商人要在他们的开发区买25亩地，准备办工厂，急于要市长拍板。在杭州还听说黄龙饭店三四月以来天天客满，其中有90%是台胞，有时甚至连大厅都挤满了。假以时日，海峡两岸总是要统一的，说不定就是在这10年里。

中国像个大鼎，台、港、澳的归还就有了三只脚。鼎有三足就站得稳。这样，广大腹地就可以在鼎腔里翻番。作为鼎口的沿海地区进一步开放也就更具有利条件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些了，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确实给了我们难得的机遇，只要我们政策对头，事情办好，不仅可以早日争取祖国的统一，而且可以争取更多的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腹地的繁荣，增强国力，问鼎世界。良机莫失，事在人为。

二

这些年，我从沿海到边区对小城镇进行了一些考察，每年东西穿梭，获得一个较深的印象是：每当腹地的经济健康发展的时候，对外开放的要求就迫切了；而每当沿海地区顺利开放的时候，又会要求腹地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了。如果广大腹地真是翻两番，仅靠香港一个转口商埠显然是不行的。最近，邓小平同志提出再建几个香港，开始还弄不大懂他讲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

清楚一点了。如果再来看看香港的发展和现状，就更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再建几个香港。

香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楼房林立，宛如混凝土大石林 车水马龙 国际往来频繁 真是财大气粗 派头十足。现在大陆 60% 的输出要靠它转口。大量利润几乎让它独占，离了它还不行。其实 香港能有今天 还不是吃了大陆的“ 封闭 ”饭一下子肥了起来的。20 世纪 30 年代香港比上海差得多，没有多少人想去。我那时出国路过香港，它还不像个样子。城市破破烂烂，临海的几条街道到处是鱼腥味。人们穿着木屐来来往往，嘈杂之声闹得行人掩耳侧目。直到 60 年代初香港仍不如上海。但是在后来的 10 年至 15 年里却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主要是搞转口贸易、金融流通以及种种投机倒把的地产生意。再后才办起了一些小工厂。到了“ 文革 ”期间 大陆去了不少人 办了许多小企业，给香港带来很大好处。但是香港地盘小，劳力有限，毕竟不是办工厂的地方。近五六年来，在大陆开放的政策下，他们把工厂扩散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搞“ 三来一补 ”，取得了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赚了不少利润。香港把它的工业扩散了，但是贸易、金融、信息和运输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却牢牢把住在自己的手里，因此发了大财。

前几年提出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在一定地区和一段时间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成功的经验。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 11 亿人口、资源又丰富的国家，我以为这不是最佳的模式。在当今讲究实力的世界，作为一个大国，首先要有自己的原材料、能源基地，然后要有轻重工业和贸易、金融、运输等配套机制。时至今日，我们应当站得高一点，为做成一个大国迈步了。

我觉得现在事情比较好办一点，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家

已经注意到原材料、能源、交通的发展。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已经进入实质性行动阶段，那块狭长地带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材料、能源供应地。这样，沿海地区的开发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发展外向型经济就多一层保障。中国的东部和西部要配合衔接 同步发展 两部都可以有一些地方先富起来 带动后进 全面繁荣。我把这种格局叫做“全国一盘棋”。

开发应该包含发展和开放双层意思。现在西部开发区已经初步兴建，那么东部选择一个港口，建立一个大陆的香港已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中国这只鼎起码在香港归还前要有一个与之成犄角之势的进出口商埠。

三

当然，这个新的进出口商埠的选择可以是多方位的。但是，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未来 21 世纪看，我认为重建东方大港——上海是比较现实的，也可以说是最佳选择。其实，我不过是在老话重提。孙中山先生早在 1914 年所著的《建国方略》中在设计建国宏图时，就提出过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中山先生是很有眼光的，当时他已看中了长江三角洲这块宝地。

上海的优势有地理的因素，但主要是历史造成的。当年十里洋场的上海，堪称东亚第二，仅次于东京。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就有 168 家银行，58 家外国银行在上海设立了分行。有一条很气派的银行街，早就是亚洲的金融中心。那时，各种商品的进口量占全国的 50%~80%，是中国最大的外贸中心。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由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工业发展很快，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近几年每年要给国家上缴 200 亿元的利润。上海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解放后，

中国被西方国家封锁了，后来自己又关上大门，上海的外贸地位没有恢复。沉重的负担使上海自身的城市建设都无力跟上去。这几十年来，上海确实是陈旧了。但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基本没有改变。要在大陆上再建一个香港，实在非上海莫属。重开东方大港也是恢复上海青春面貌的有效措施。

我在江苏考察时，国务院宣告正式批准开发浦东区。到了上海，正遇上市人代会召开。于是会内会外，上上下下的热门话题自然就是开发浦东了。大家都挺高兴，也有几分激动，都觉得这是国家扩大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推动上海发展的一股强劲力量，而且必然也会推动长江沿岸各城市的经济发展。

那么，我们所设想的开发长江三角洲与浦东开发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显然二者原是一回事，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彼此衔接、相互补充。其实，从全局来看，问题的关键不完全在这种关系方面。而在于浦东开发后，上海究竟是建成深圳式的上海，还是香港式的上海？这是两个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我以为，上海不能走深圳的路子。这是因为上海的地位本来就与深圳大不相同，再说现在腹地的经济状况与 80 年代初期也大不相同了。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换言之，上海应在经济上成为江、浙及沿江城市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那么，上海就将是一个具有广大腹地的“香港”。

从世界各国来看，进出口商埠都具有优良的港口或便捷的交通。上海处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清代康熙年间就设立

海关，鸦片战争后即辟为通商口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沿海岸线上海居中，北有连云港、南通港，南有温州港、宁波港，沿江西进，有张家港、镇江港、南京港。现在，沿海、沿江的这些港口却苦乐不均，忙闲不一。有的吞吐量不足，经常吃不饱，有的却常年压港，上海港的码头几乎周转不过来。如果将这些河海港口统一规划，分层开发，形成网络，分工协作，对外开放，组成以上海为龙头的港口群，上海就可以利用自己在贸易、金融、信息、科技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组织货源，合理安排流向，及时调度调节，各个港口的作用就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得到更大发展。这个经济布局远胜于香港。

拥有上海的长江三角洲，原是农业发达的鱼米之乡，是盛产粮食和畜产品的宝地。而且又连得上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广大腹地。就这方面来看，上海有条件通过内河航运和铁路公路运输，成为全国性的对外贸易中心。20世纪30年代，中国60%的茶叶和猪鬃就是从上海出口的。

说到这里，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的内涵已经逐渐明确起来。我还想强调一点，这个开发区内将存在分与统的双层结构。基层是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包括国营、集体、个体、独资、合资、合作等所有制，是多元化结构；上层可以是上海与江、浙合作并和国家配合形成高层次的贸易、金融、运输、科技服务中心体系，只有强化这个地方和国家的服务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全结构的统一协调。不难看出，这种双层结构既体现了开发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总格局，又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

四

这次南行，我还有个打算，其实也与开发长江三角洲有关。